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7.02.004

“非科学性”让管理研究变得更好： “蔡玉麟质疑”继续中

韩巍¹ 赵向阳²

(1.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 基于对管理研究可能面向的探讨,意在凸显“非科学图景”的学术价值。首先,重新解读了《管理学报》2016年第8期刊发蔡玉麟先生的论文,并将其核心质疑引向对管理研究“单纯科学性”的反思;然后,剖析了IACMR主导范式的“合理性”,成功的情境因素和面临的挑战;再次,对多元范式给出更加“实用性”的讨论以强调问题决定方法;最后,展望了IACMR在学术评价和研究成员培养中的更有承担的角色,提出“徐淑英难题”并主张以诠释主义作为替代性的研究进路。

关键词: 非科学性; 蔡玉麟质疑; IACMR; 多元范式; 徐淑英难题; 诠释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7)02-0185-11

Being Non-Scientific Makes Management Research Better: CAI Yulin's Question Continues

HAN Wei ZHAO Xiangyang

(1.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2.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imensions of management research (MR) in order to open a non-scientific window for MR, which will contribute more academic value. This article firstly offers an interpretation on CAI Yulin's paper and reshapes its core question into the management's single scientific dimensional bias. Then it explicates why IACMR tends to adopt positivist paradigm, why it is so successful in current context and what troubles it must cope with in the future. Thirdly, it presents why multiple paradigms should be appreciated so as to make the problems to determine the methods. Finally, the article anticipates IACMR to play a more active and responsible role in assessment on scholar's academic work and in scholar'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nne S. Tsui's conundrum. Further, it states 'interpretivism' as the optional approach in MR.

Key words: Being non-scientific; CAI Yulin's question; IACMR; Multiple paradigms; Anne S. Tsui's conundrum; Interpretivism

“非科学(non-scientific)”并非“不科学(un-scientific)”,普特南^[1]用以指称那些无法还原为物理学话语的概念,也是理解生活的可能方式^[2]。本研究借用“非科学”特指那些在管理研究中不能满足实证研究基于测量,重在演绎-假设检验之形式要求的研究取向(如诠释主义范式,叙事、思辨方法等)留给人们的印象。当然,学界对于何谓“科学”及如何为科学分类依然存在分歧。近期,邓晓芒^[3]就试图通过解析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以纠正英文“science”给中文世界在“科学”认知上造成的困扰。

《管理学报》在2016年第8期的编者按中表示^[4],以对中国管理研究发展状况的肯定和对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功莫大焉”的评价为背景,为了深化“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推进“管理理论创新”,于2016年7月发表了《中国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以下简称《张文》)^[5],8月又刊登了《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家化和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以下简称《蔡文》)的质疑文章,将《蔡文》的看法提炼为管理研究(的

收稿日期: 2016-11-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71232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71302107)

属性),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除了“IACMR之路”外,是否应该还有“德鲁克之路”?是否有必要形成本土领袖级组织奔向德鲁克之路?

笔者撰写此文并不是对《蔡文》的简单声援。然而,第一次实名发表文章的《管理学报》前执行主编蔡玉麟,观察管理学界12载,其“呐喊”用意何在?表面上,《蔡文》因《张文》总结IACMR成立来的工作业绩而起。深层次讲,不得不钦佩《蔡文》作者的真诚,理解前辈的心结,即无论对于IACMR,还是其他管理学会(学院),面对管理学界表面繁荣背后的重重危机^[6,7](按照席酉民的说法,学者们再不反省,就有被抛弃的危险!^①)都不该急于“树碑立传”。或许在《蔡文》看来,IACMR就是管理学界诸多困扰的“始作俑者”,因此,才希望在管理学界举足轻重的IACMR能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更大的担当。

1 对《蔡文》的简要回顾

(1)关于管理知识情境化及普适性的讨论^② 笔者认为本质上管理世界没有普适性知识^[8](“去情境化知识最多是一种幻觉”^[9])。《蔡文》所认定的那些“普适知识”,因循“实践成功(国力、文化影响力)-本土(情境化)知识生成-(跨地域)传播、渗透、扩散-被(落后地区)接受-(可能)被检验”的技术路径。既是学术运作的结果,也是典型的“社会建构”^[10-12]。

进一步地,在《蔡文》中,由“情境化”衍生出“文化特殊性”议题。例如,《蔡文》引用了陈春花、郭重庆、徐淑英、任正非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据此认为这些问题都与“文化的特殊性”无关。但在笔者看来,“人为什么活着?”固然表面上“没有文化特殊性”的困扰,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中国人’为什么活着”,则未必只有“普适性”。与之比较,“组织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中国情境下生存”才切中题意,才是“情境、文化特殊性”的影响所在。尽管《蔡文》直接引用了几位学者、企业家的重大关切:郭重庆的“国家创新体系”本身就可能是“中国情境下”的问题;徐淑英提到“贪婪、贫富分化、政商勾结、企业社会责任”,就其现象背后的机理,才体现了“文化特殊性”。至于任正非提出“智能社会对管理的新挑战”,也未必是当务之急。中国企业家真正面对的问题或许尚难以进入公共论域。例如,同样是著名企业家的柳传志的那句声明:“坚决不做谭嗣同^③”才是“文化特殊性”之所在。

《蔡文》提到德鲁克的“经典五问”,尤其是前三问,即“我是谁?”、“我在哪里工作?”、“我应该做什么”^[4]?却也是反驳《蔡文》“情境化-文化特殊性偏见”的证据。这是因为这3个问题正困扰着中国大学的广大教师!大家不知道自己是谁(大学教师、研究者、论文制造者)?大家到底在哪儿工作(身在大学工作,但“大学”在哪里)?大家应该做什么(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开展教学、服务社会且如何平衡)?

(2)关于管理理论创建及相关论述 笔者与蔡玉麟一样,对德鲁克心怀仰慕。但其在管理理论创建上的贡献则无需夸大。管理中大量复杂、具体的问题绝非德鲁克的思想、洞见所能覆盖;同时,《蔡文》中关于管理“知识属性和知识形态”的讨论虽不无启发,却不宜看作文章的重点。关于“理论创建”,更应该参看《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13]及《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该书与徐淑英和IACMR有密切的关联)^[14]。《蔡文》中“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的论断值得商榷。管理研究的对象是管理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实践研究”。多元范式视角下的“实践”意味着“命题、规律、过程、意义、方案”等多重面向,自然不会只有“德鲁克道路”。关于“综合运用各类知识”,也未必不需要“分解、解析”,管理的某些具体问题,恰可类比为“工程技术”问题,套用某些“科学原理”加以优化。当然,蔡玉麟认为这不是管理研究^[4]。

(3)《蔡文》中看似正确却未经深思的建议 比如学术评价不是单纯比文章,“只比谁在中国情境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强,谁解决问题的效果更好,谁对中国政府、企业 and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贡献最大”。这种说法虽掷地有声,但实际上难以操作。发现问题的能力,未必有提出问题的勇气(因为情境不允许);解决问题的效果好,还要看依据什么标准,谁来判断(文化特殊性)。例如,IACMR提升管理学院发表英文论文的能力就很强。至于对中国政府、企业 and 非营利组织发展贡献大,更需要界定何谓“发展”,且站在哪个情境下,由“谁(权力拥有者)”来做判断(情境及文化特殊性)。

① 互联网时代,在引证方面也面临新的考验,本研究的促成与学者在邮件(微信)群的互动交流密切相关,作为学者的自述文本,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研究有几处类似的引用。考虑到邮件和微信平台“语境”的特殊性,的确存在曲解“作者”真实想法的风险。

② 见韩巍《情境研究:另一种诠释及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一文(《管理学报》已录用,待刊发)。

③ 见《柳传志谈政商关系:坚决不当谭嗣同》(<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40331/151018667633.shtml>)

本研究最关注《蔡文》中的两个重要质疑，希望学术争鸣的参与者既要客观公允，也要辨明道理。不然，一场严肃的学术争鸣就有可能蜕变为学术政治的噱头。具体如下。

(1)《蔡文》依据 IACMR“反常”的演化轨迹，质疑中国管理学界“为何不少走弯路”

“IACMR 创会会长徐淑英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极力维护实证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呢？原本后发优势恰恰在于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4]。望文生义，容易产生不好的联想。徐淑英（而非 IACMR）从推崇“实证研究”，到强调“情境化”，再到呼吁“科学精神、社会责任”^[7,15,16]。在《蔡文》看来，这一“反常”的思想进路似乎就是证明。但如同徐淑英等学者合著的《组织与管理的实证方法》一书中所显现的那样，把“empirical methods”翻译成“实证方法”；在书中又收录了黄光国有关“不和谐”的批判“素朴实证主义”的内容^①，再参考徐淑英“不具备科学哲学家资格”的声明^[16]。这种认识上的“自我矛盾”更有可能是徐淑英及其周边的核心学者，疏于了解管理学界的“范式冲突及哲学反思”所致。后来徐淑英以一己之力反思、批判管理研究之弊时^[11,16,17]，以其目前在学界的地位却“后知后觉”就略显尴尬。但这不是恰好说明徐淑英对于学术的真诚吗？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难免“后知后觉”，学术领袖（领导）有其感召力，追随者常会表现得“从善如流”，何况还有许多现实利益。即使领袖（领导）们指错了方向，也先不必“犯上作乱”。等到事易时移，大家自有一套合乎情理的生存逻辑（又是中国的文化特殊性）为自己开脱。相信《蔡文》的指责也是针对 IACMR 而非徐淑英个人，这一点应该澄清。

(2)“科学化未必是管理研究的正途”《蔡文》中有作者的质问，“原来管理学者们的尊严是以牺牲管理理论创新和实践相关性为代价的”，并呼吁“管理科学化运动背离了管理学的根本属性，理应及早中止”^[4]。这支投枪几乎扎向每一个管理学者，也是《蔡文》最重要的质疑。一方面，动摇管理研究的“科学性”会让研究者感到“不可理喻”。相信徐淑英（IACMR）不会认同，尤其是哪怕是部分地“丧失科学性”的管理研究如何持续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一方面，至少颇具“科学样式”的实证研究有资格捍卫管理学术的“科学形象”。由此，《蔡文》才会向以实证研究为主导范式，且维系着管理学术“科学地位”的 IACMR 发出“呐喊”。在此，本研究提出一个适于管理领域学术

争鸣的专有词汇——“蔡玉麟质疑”（并不对应本文的“质疑”），即由管理学界利益相关者（圈外人、边缘人）针对学术共同体主流成员在研究目的、研究态度及研究范式、方法，以及研究成果评价等基础问题上的批判性反思。

2 IACMR 的主导范式、成功之道及挑战

2.1 IACMR 为国际化而生，适合以实证研究为主导范式

与《蔡文》不同，本研究以为《张文》还是较为客观地概括了 IACMR 的快速发展和已有成就，并对中国管理学界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反思^[5]。例如，管理学界在研究态度上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信仰缺失、群体迷失”；不仅承认实证研究在 IACMR 的主导性，也坦诚其在理论建构的不足且存在割裂现实的嫌疑（稍有遗憾地，该文作者没有意识到把诠释学、现象学归为“后实证主义”的错误）。《张文》以学术社群的视角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国际化，从“商学院（管理学院）的角色，学者的自觉反思与行动建议，学术期刊（选稿多元化）、学术会议、官方学术机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对应 3 个阶段“待解决问题”，即“研究范式的反思，研究道路的选择，科学研究主体应该如何行动与落实”，主张多元范式、现象驱动、情境研究，并具体化为“严谨与实用”两手抓，“情境与普适”的平衡，近乎是当下管理学界应有的共识？

当然，《张文》也存在一些缺失。例如，既然《管理世界》、《管理学报》发表了一些反映本土情境、规范严谨的案例研究论文。除了“严谨性”以外，是否做到了“情境与普适”、“学术严谨性与实用相关性”的平衡却只字不提。前文归纳出“贡献有限”，后面又说“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研究成果”^[5]，其判据又是什么？其实这种自我矛盾并不难理解。首先，IACMR 的最大诉求是“国际化”，是“国际（顶尖期刊）发表日益增加，中国管理研究占有一定地位，获得一定认可”。应该欣赏该文作者的诚恳，他们也注意到郭重庆的警告，追求在国际顶级管理杂志上发表论文，可能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

①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主编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一书，其英文名称是“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将“Empirical Methods”翻译为“经验研究方法”更为恰当。而“实证（的）”最对应的英文应该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形容词“Positivistic”，鉴于西方管理学界对多元范式争论的敏感，多采用宽泛的“empirical research”而不是狭义的“positivistic research”。而该书收录的黄光国的《建构中国管理理论的机会与挑战》一章，恰恰在批判素朴实证主义（naive positivism）。

靴搔痒的问题”^[5]。其次,IACMR最习惯的措辞是“严谨性”、“普适性”,而严谨性更是根本,所谓兼顾“实用相关性”更像是应景的修辞;“先做本土”也只是手段,“最终普适”才能达到目的,而且最终还是要“走向国际化”,其内在逻辑清晰可见。

在学者邮件(微信)群的讨论中,赵向阳对《蔡文》的归纳理解是:IACMR的学术主张,即“把管理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和“国际化”,比照15年中国管理学界和60年北美主流管理学界的经验,看起来此路不通。韩巍的理解是:此路不通,当且仅当“把管理只当作科学来研究=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化”。有理由确信,这不是对IACMR的妄加揣测。但考虑到IACMR以“追求卓越、灵感之源、学术责任和奉献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以“为国内外从事中国管理研究、教学以及实践的人士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为目标的理想,“以科学为诉求的实证研究主导的国际化”足堪重任吗?

因为要国际化(北美、英文),自然要取径国际主流的风向标。一方面,IACMR创立者的范式偏好对该组织的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海内、海外的华人管理学者要发表英文论文,最擅长的只能是“实证研究”而不会是“理论建构”、“哲学思辨”和“描述、叙事”。由此,回顾IACMR1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佐证了IACMR推进国际化的坚实脚步以及对实证研究范式的倚重。

实证研究范式作为广受关注且被普遍接纳的研究立场和技术路径,其背后的“实证主义”尽管在哲学世界早已备受责难^[18],但在大学(学院)合法化过程中却具有天然的优势:①基本诉求和样式非常符合大众尤其是管理研究者对“科学研究(客观、普适、规律;理论-假设-测量-数据-统计分析)”的预期;②秉持实证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体成熟较早,有清晰的研究路线和优选的研究方法,使其在生产研究成果尤其是批量培养学术接班人方面表现突出;③实证研究范式在学术竞赛中的成功(仅以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三大管理学上游学科为例)建立并维系了管理学科的合法性确立。可以设想,如果在中国,没有“管理科学和实证范式主导下的经验研究”,而是以“诠释主义和批判理论”或其他范式为哲学基础,“管理研究”怎么可能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接纳。本研究无意诋毁实证研究,指责IACMR的所谓原罪。况且,从《张文》

的发表经过几任主席的审定也能窥见IACMR对多元范式的响应。

事实上多元范式早应该是国际管理学界的常识^[19,20]。面对中国典型的多层次嵌套(尤其是纵向权力结构)情境下的管理研究,该如何处理“外生-内生因素”的影响(情境及分析单位);如何判断(控制)那些“难以测量、不可测量”因素的影响(数据的可靠性)。尽管自然科学同样会遭遇这种“尴尬”,但其理论猜想“精准”的预测能力远非管理研究可比。这是因为管理研究有太多相反的证据以及令人失望的成果复制率^①。

鉴于此,管理学界有必要反思实证研究的“霸权”地位。例如,管理类学术期刊曾经发出的“只发实证研究文章”的声明^[22],历史地看,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笑话”!所谓“学术霸权”也并非一种草率的政治化标签。它意味着实证研究者会用自己专属的“技术(严谨性)规范”去苛求其他范式的研究者遵循一致的标准(忽视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多实证研究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认识^[23])。大家经常听到如下的忠告:要“客观、严谨、数据是否普适”等。总之,实证研究者所不知道的,只剩下错误和荒谬^②。坦率地讲,以西方管理学界多元范式的“标准”衡量中国管理学界的国际化程度,实在差强人意。仅就这一现象而言,IACMR就有必要反思其巨大影响给管理学界带来的偏颇。

人类在逻辑和事实(这是学术共同体多数成员的共识,也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以外,还有其他的面向和诉求(比如“科学”信念),而在“科学主义”盛行的管理学界,必须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寻求某种“最大公约数”式的和解。试想,今天这个充满“左、中、右”剑拔弩张的时代,如果不能彼此包容,不求助权力,社会何以前行;永远依靠权力,社会又如何进步?

人类是需要信念的物种。作为一名管理研究者,可以抱持作为“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的自我认同,相信自己在从事“科学研究”。但应该意识到对于“科学、科学研究”的过度信赖尤其在人类生活中并不可靠。管理的复杂性需要大家放弃“社会工程”的妄想而转向“多重可能性”的想象。关于那些显然建构于自身社会化过程的“信念”,需要不断反省且应该接受别人

① 参见文献[21]中提到的HUBBARD等的系列研究,当然,TSANG和KWAN对“低复制率”也做了辩护。

② 见韩巍《洞见以下皆为修辞:“伟大思想”对本土管理研究及理论建构的启示》一文(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已录用,待刊发)。

(实践者、同行及哲学家)的质疑。例如, IACMR 成立之初, 港台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已声名远播。假如黄光国的“多重典范^[24]”从一开始就成为 IACMR 社群中的一种强势声音, 那么, 至少今天对于多元范式的呼吁和讨论就会深入细致得多。

2.2 IACMR 成功的“秘密”

学者喜欢心怀天下, 但总应该先把自家的事情做好。难以理解为什么“定位”于国际化之补缺市场的 IACMR 会在中国管理学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难道有那么多学者, 有那么强烈的意愿要把自己关于中国组织管理的研究成果(暂且勿论对于中国组织管理实践者的价值)首先(主要)推介给西方管理学界吗^①? 是为了“学术自信”(至少暂时地, 不过是修修补补^[6,7]), 是为了中国组织管理实践(有多少中国管理实践者会阅读英文文章), 还是为了“拯救”世界(期望成为全球管理实践者的向导)——发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此, 大家千辛万苦、绞尽脑汁、各显神通, 耗费了多少精力、资源, 甚至丧失掉学者(学术)的尊严。

《张文》有一句语焉不详却得以窥测端倪的表述: IACMR 的成功“正好对应了中国管理研究快速实现国际化的进程”^[5]。这正是《蔡文》忽视中国情境(所谓“时势造英雄”), 由此过分苛责 IACMR 的偏颇所在。当然, 有必要修正《张文》的判断, 不是“中国管理研究快速实现国际化的进程”, 而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感召下, 不遗余力、不计代价地热衷于创造以 GDP 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大学)繁荣。一方面, 是大学数量和容量的迅速扩张; 另一方面, 是大学在官方主导下进入普遍依赖“发表论文、国家课题、研究基地、名牌工程等”体制化、指标化的校际排名竞赛。而最关键的就是“论文发表”, 是“SSCI(SCI)论文发表”及按期刊排名的“高水平 SSCI(SCI)论文发表”。整个大学系统以标杆学院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参照, 围绕中英文期刊排名你追我赶, 逐步实现了借由论文发表, 尤其是 SSCI(SCI)论文发表与个体(群体)“职称、获奖、荣誉及经济利益”的紧密捆绑。试想, 发展历史短暂、研究规范性欠缺却急需提升“产量、‘质量’”的中国管理学界, 面对秉持“追求真理、造福世界”宏伟愿景, 携主流研究范式的技术专长, 加之其核心成员优异的英文发表记录的 IACMR, 怎么可能不“从善如流”。况且经验证据表明, 单纯从英文论文发表的“数量”和从事国际主流范式研究人才的培养

上, IACMR 的确功勋卓著^[5]。

必须承认, 在这场管理学界风起云涌的学术竞赛中, “实证研究”对比其他范式的研究方法优势明显。它以研究方法训练(掌握研究工具)为主, 允许保持与经验世界的隔离(常采用问卷调查法、“简易”的实验法收集资料), 从既有理论视角(常以文献为问题意识的源头)出发, 遵循“(演绎)假设-检验”的研究进路, 容易形成“短平快”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因应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背景下大批量生产博硕士及提升论文发表数量的需求压力, IACMR 的出现既是“雪中送炭(普通学院)”又是“锦上添花(重点学院)”。时至今日, 管理学界终于普遍认为, 做一名光荣的国际主义管理研究者(发表 SSCI(SCI)论文)的贡献显著大于一名狭隘的民族主义研究者(只发表中文论文)。

当然, 管理学界也存在另一种声音。例如, 陈明哲明确表达过对“学术评价指标化”, 科研“排挤”教学甚至是美国管理学界现状的不满。笔者在与他的交流中曾达成过一个口号式的共识, 对于中国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大多数老师(不是参加学术奥林匹克竞赛的合格选手), “To be a qualified teacher is more than enough”。他认为“发表国际论文”绝非中国管理学界的当务之急, 强调管理研究的“经世致用”^[25]。

显而易见, 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从事研究, 无论陈明哲的主张还是黄光国的反思都不大可能是彼时“最可行”的选择。因为前者不够“与时俱进”, 后者涉嫌“清谈误国”。徐淑英从 2009 年以来的真诚反思, 先勿论其方向感的对错, 又有多少管理研究者受其感召转向具有“社会责任”的研究? 又有几所管理学院值得被冀望秉持“做负责任科学”的核心价值呢? 当现实利益被迅速制度化而广泛扩散的时候, 个人何以对抗学院, 学院如何对抗大学, 又怎能期望一所大学对抗教育部以及整个社会大局。于此, “同情之理解”或许比“平庸之恶”更符合集体意志。可悲地, 类似的戏码反复上演。

2.3 IACMR 的“资产与负债”

如果 IACMR 只是意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学术组织, 笔者不仅完全认同《张文》的概括, 也会对《蔡文》的苛责表示遗憾。必须承认 IACMR 在实证研究方法规范性和 SSCI(SCI)论文发表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已成为中国管理学

① 管理学界有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 学术研究是一场奥林匹克竞赛。如果学术研究果真可以这么比喻的话, 常识而言, 也不该是一场“全民运动会”吧。

者走向世界学术舞台最宝贵的资产。

然而,尽管《张文》、徐淑英对实证研究有所反思,但其思维惯性却不易消除。笔者以为实证研究远不如其所承诺的那么“客观”,其拥护者对待现实的“主观性”随处可见^[22]。常常把复杂的组织管理现象用特定的理论视角加以剪裁,意图用很少的几个“既有构念(变量)”间的关联昭示某种稳固、可靠、深层的经验规律。很多实证研究者怀揣成为“pure scientist”的梦想,致力于提供“去情境(去时间、去空间)”的普适性知识。即使当他们意识到情境的重要性,却依然期望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消解情境化对于普适性的羁绊^①。但现实的复杂性,尤其是管理实践中的“时间性、空间性、系统性、特殊性以及人的不确定性”使得实践者很难对管理学者所生产的琐碎知识有切实的感悟和友善的对待。他们习惯于使用“严谨、科学、实验、统计分析”这样的词汇建构一幅自我防卫的“学术画卷”,但常常对科学研究中最为基础的“测量”问题态度轻慢,也很少为大量“常识性的假设”感到犹疑。

作为一个着力培养青年研究者的学术组织,应该意识到尽管实证研究的“比较优势”容易催生当下学术情境中的精英学者,但长期接受这种单一范式的训练的研究者会逐渐远离现实,难以从管理实践的困扰中形成问题意识;会习惯于忽视现实的复杂性,把管理研究等同于抽象概念关系的摆弄。从而造成长期危害管理研究的两种“负外部性”:①在管理实践(者)面前,缺乏经验常识及学术洞见的幼稚化倾向;②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坚持对复杂现实过分简化的研究习惯(单一范式的主导地位),加之评价机制的裹挟,呈现出“求知与发表”的分裂。如果管理研究只等同于这种“游戏”而且代代相传,IACMR受人诟病也就显得“名至实归”。作为多元范式的提倡者,笔者从内心尊重那些真诚的实证研究者的抱负和雄心,但在预祝他们描绘出人类组织生活的终极画卷之前,请认真对待“测量”的可靠性,请提出一些“反常的假设”,请穿透现象的迷雾揭示深藏其中的机制。否则,越坚实的“科学主义”信念就会成为越远离“科学精神”的负债。总有一天,有人会和管理学界所取得的成就重新建立一张资产负债表,因为有必要更客观地评价(审计)当下那些给研究者带来可观利益的SSCI(SCI)论文,到底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什么^[26,27]?

3 再谈多元范式

争议,至少表明彼此的诚意;反思,至少证明管理研究者还有关乎意义的诉求。徐淑英自2009年以来的呐喊足以展现其作为学术领袖的担当却也未必没有“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同道人不理解她的批评和反思;而“外人”则可能怀疑她始终走不出自己最习惯的实证研究范式禁地。笔者在此提供一个问题驱动及实例剖析基础上的解读。

3.1 不要空洞的多元范式,让问题决定方法

尽管在广泛的社会研究领域,实证研究范式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学院体制化的学术中“比较优势”明显。但面对复杂的人类组织生活多元范式应该已是学界共识。问题是很多人开始习惯使用“多元范式”的说法,但认识上还是存在很大分歧。笔者希望用另一种叙事(诠释)方法,再提供一些“多元范式”何以必要且何以可能的线索。以突显一个最为重要的多元范式立场,即问题决定方法!

(1)问题1 你想知道企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选择多种范式,但可能更适宜采用人类学、民族志、现象学描述等方法,长期跟踪后的案例研究。尽管大家不认为可以重现那个“事实”,但这些方法相比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而言,应该更接近所谓“真相”。

(2)问题2 你想知道企业实践背后蕴含了什么(机制) 你可以选择多种范式,但可能更适宜采用批判现实主义方法。不过这种研究需要跨越足够数量的“具体情境”且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千万不要习惯于从既定理论视角提出一个自我满足的机制性猜想。

(3)问题3 你想知道某种条件下(这种控制尽量与实践者的期待相符,不然就会犯无关且碎片化的偏误),某些因素(构念及变量)的关系或作用机制 就请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先扎根再实证,或者先案例(比如求助于文献^[28])再“假设-检验”的方法。其关键是可靠的测量以及“有趣、反常,有实践启发性的假设”。

(4)问题4 如果不相信管理实践背后会有什么本质规律,或者认为不需要什么规律 这时肯定不会选择实证研究范式,那么请采用诠释学的、叙事的方法,甚至诗歌的^[29]方法去展现实践的意义,提供更多可能性的猜想。

(5)问题5 如果你认为明天应该更好,历史

^① 见韩巍《情境研究:另一种诠释及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一文(《管理学报》已录用,待刊发)。

和今天已然问题丛生。那么就多读一点批判理论。例如,你一直是下属吗?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领导不够明智且非常顽固吗?等等,不一而足。可以保证,假如以“anthropologic、ethnographic、phenomenal、longitudinal (case study)、critical realistic 等”为关键词去检索相关数据库,一定可以找到海量的文献以及研究范例,尽管那些文章未必发表在 ASQ、AMJ、AMR 以及 SMJ 等顶级期刊上,且那些文章几乎都不是中国(海外华裔)学者的作品。

为了迎接一个真正的多元范式时代,有必要谈到管理研究的学术训练。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无论什么学术背景,是不是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管理研究,需要完善如下知识结构:①知识 1:情境知识,即学习一些必要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多少弥补一下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的尴尬。②知识 2:范式-方法论知识,可以阅读黄光国^[24]的《社会科学理路》,或者纽曼^[30]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甚至邓津等^[31]的《定性研究》),而不是先看或只看《组织研究的实证方法》及更多实证研究的范例文章(知识 2-1)。③知识 3:理论知识,因为(知识 2-{X})里的选项远不止实证研究一种,因此,需要稍微宽阔一点儿的理论视角(涉及“个体-群体-组织”),这是一个艰苦而耗费时间的过程。④知识 4:经验知识,即多了解当下组织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请注意,此处所理解的问题未必是实践者所表达的那些表象层面的问题,尽管这里面蕴含着某种违背现象学教义的讽刺性。而且如果不是那种见微知著型的天才,最好从“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先寻找贴近现实的感觉)。最后,无论靠自己还是导师,要解决一个十分关键且涉及“规范性-严谨性之技术标准”的问题(实证研究者最该反思的问题):即被研究者所“发现”的“问题”,需要什么研究方法与之匹配?请注意,不同范式对于“技术标准、学术品质”有不同的理解^[23]。

至于如何走向多元,或许不该表现得那么自负,谁有资格给别人指点迷津。因为这类是一场考试。

3.2 一份多元范式论者的“答卷”

在学者邮件(微信)群中,南开大学张玉利发问:“拿一个具体问题,大家各自依据自己的理论思想(范式),谈怎么研究,是否更好?并抛出两个问题:①人为什么工作?除了社会交往、经济利益之外还有什么原因?②一个人如何向别人证明自己是清白的^①?”

(1)关于问题 1 首先,假定大家对“工作”有一致的理解。实证研究者的思维习惯是作为“结果”的工作,必有诸如“社会交往、经济利益”之类的“前因”,其挑战在于“时间序列上的因果互动链”。作为特例,有些人其实并不需要工作。如果以个人经历而言(不工作就是等死),更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最终决定当一名大学教师?笔者的“想法”是:(尽量)拒绝过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当然,有一个操作性构念,即“自我认同”可以与“社会交往、经济利益”相类比。但将“职业选择”解读为一段“becoming, sense making”的生命历程更符合诠释主义者的想象。进一步地:今日之学术生活为什么让人感到难堪?笔者的“做法”是:撰文批评实证研究范式的霸权^[22],批评学院的学术评价办法^[28]。事实上,作为一个本土管理研究者,还必须反复思考“工作、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等概念的情境化解读及与“自我认同”的关系,这必然会涉及不同范式(经典或者建构)的扎根理论,现象学叙事及反身性^[32,33]。

(2)关于问题 2 针对张玉利提出的“如何向别人证明清白”?以下是一个多元范式及本土管理研究者心智地图的投射。鉴于情境作用,先建构一个谱系式的认知框架(假定),一种极端的情况(端点 1):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很诚实,自然无需自证清白;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讲假话,几乎无法自证清白,除非由权力拥有者裁定“我的清白”且无论我是否清白(端点 2)。人们会自认为生活在这两个端点间的某个位置,有时候会倾向端点 1,有时候会接近端点 2。

“如何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哲学家会说:“我清白”,当且仅当我是清白的。深刻却也“荒谬”。这是因为生活世界很难满足这种“真值条件”。设想一个具体的情境:①场景 1,在一个狭窄的巷子,我骑着车子,对面走来了一位 70 岁的老人;②场景 2,老人倒在地上,我扶着车子站一旁。

情形 1 我不用自证清白,因为摄像头拍下了事件的完整过程(而且录影不能无故消失),因此,“铁证如山”——这是实证主义的胜利,其实我向来推崇(自然)科学。

情形 2 我不用自证清白,因为有证人在旁,并向警方(假定他们明察秋毫)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听起来与录影有一样的效力——

① 感谢张玉利的两个具体问题,激发了展现多元范式影响力的思考。

还算是实证主义的胜利。然而,我不会那么乐观,因为其间必须引入太多“不可控制的条件”。比如,证人不能有性别、年龄歧视,其视力、心智、表达必须正常,并为人正派和正直等。但只要上述任一个条件不成立,就无法证明我的清白。证人的确提供了一种描述,但那只是其所“看到”的“事实”——这是社会建构论的胜利。曾经确定性的世界已经终结,警察毕竟不是上帝。

情形 3 我必须自证清白。在警方看来,老人、我、证人都描述了事件的经过。让情况变得稍微简单些,尽管表面上有3个“故事”,但某两个故事的重合度较高,警方“看到”了“事实”——这依然是社会建构论的胜利,而且需要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18]。作为特例:①情形 3-1,警方有时也会犯错,我知道我撞了人,但我的修辞能力强,我被“证明”为清白,只有上帝知道另一个“事实”;②情形 3-2,上帝偶尔也会犯错,我猜不出上帝会“看到”怎样的“事实”?更不用说警方。

情形 4 我无法自证清白。警方果然不是上帝,我不得不承担所有责任,尽管我是清白的。天理何在(我比窦娥还怨)?——我因为愤怒而产生了某种冲动(以下省略),这几乎就是批判理论(到底谁有权力以什么方式决定一个人的清白)要发挥作用的前兆了。

情形 5 我拒绝自证清白。尽管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我承担了所有责任,因此,我准备做一回上帝!毫无疑问,这是信仰的胜利,与范式无关。

上述兜售“多元范式”的手法可能有些拙劣,当且仅当上述表述没有带给大家在理解“自证清白”上哪怕一丁点启发。或者碰巧,竟然会有所触动,引入多元范式的意义即在于此。当然,多元范式只是管理研究“自我救赎”的第一步,“问题决定方法”也不会有更多的承诺。笔者从《管理学中伟大思想》一书中获得的启发是,特定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视野(视角)、研究技术、语言习惯、价值观及审美标准共同决定了研究者成为有“洞见者”的可能^①。

4 冀望 IACMR 及“徐淑英难题”的消解

4.1 冀望 IACMR:行动决定结果

如果 IACMR 只承认“问题 3”类问题研究的合法性,因而坚持采信“知识 2-1”(见前文)类知识及匹配的研究方法继续“国际化”,则其他无意于国际化且持非主流研究范式的研究者,选择远离 IACMR 即可。但如果 IACMR 及其

多数成员,确如徐淑英一样抱持着“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以及对那些优秀成果“修修补补性”的不满^[7,16,17,34]。那么一次真正面向“实践、问题”,从而多元范式的转变就非常值得期待——管理研究需要直面中国组织管理的各类实际问题,以问题为驱动,选择适宜的分析单位,采纳多元研究范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其呈现方式可以是数学模型、统计分析、现象表述、理论思辨等。而且,应该尊重不同范式在哲学立场、表达方式和研究品质判断上的差异。总之,它应该尽可能被研究者、实践者所接受,且能够启发研究者及实践者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持续努力。

行胜于言,既然作为 IACMR 杰出代表的徐淑英在持续反思,批判“数豆子”的学术评价^[16]。那么,IACMR 为什么不公开抵制当下盛行的学术评价方法?至少不该继续为“中国大学的学术 GDP 运动”背书。而姿态转换为行动的重要标志,即 IACMR 仔细甄别其“优秀成果-经典论文”。通过出版、宣传,会议、工作坊让研究者尤其年轻学者有更明确的努力方向;同时,大家对 IACMR 扩大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影响力(发表英文文章)的作用深信不疑,也乐见高水平选手在国际学术“竞赛”中高歌猛进。

既然拥抱“科学精神”,就应该勇于质疑和反思,尤其是 IACMR 的内部反思。如何筛选出典范论文,IACMR 应有共识。不是从期刊档次的角度,不是从作者声望的角度,而是从“问题意识”,从多元范式的“规范-严谨性(作为学术品质鉴别的比喻)”及“结论的启发性”上综合判断^[28]。此外,IACMR 也可以调整自己对于“international”的理解,把向来被认为不够规范、严谨的“中文论文”包括进来(符合“国际化”的宗旨,试想,那么多研究者都需要一边吃着中国的粮食,一边为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操心吗)。大家都深知这些研究在平均意义上的欠缺,但其中可能蕴含着某个重要的“问题意识”,新颖的理论视角,启发性的反常猜想,具有解释力的机制(模型),原创性的认知框架,哪怕只不过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企业管理故事”。

既然强调“社会责任”,就应该勇于接受批评和挑战,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其他范式的研究者、管理实践者。组织不同学科、范式研究者间,研究者与实践者间的频繁互动。学术活

① 见韩巍《洞见以下皆为修辞:“伟大思想”对本土管理研究及理论建构的启示》一文(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已录用,待刊发)。

动(年会、工作坊)不要只满足于设置那些“主流、严谨、发表”类议题。也不宜随着“领导意志、社会热点、流行方法”不断更新、变换焦点。参照 AOM 的使命,为了使管理研究真正服务于“A better China”,IACMR 需要有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更加专注的问题意识。本研究以为,当代中国管理研究者需要积极回应以下问题: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置身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应该建构并维系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有效的、有操守的,有格调的。应该意识到组织不仅塑造着新的成员个体,创造着新的群体生活经验,最终,还会显著地影响到这个社会、乃至中国前进的方向和进程。最为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并不只是“客观现实”无助的接受者,我们都参与其中且责无旁贷。

4.2 徐淑英难题及“非科学性”研究进路的启示

为了表达对 IACMR 和徐淑英的期待,本研究提出“徐淑英难题”,指管理学者为了追求“真知^①”,却无法消弭其哲学立场(范式)与具体的学术实践的内在矛盾,以及偏好的研究方法与实际问题的不相匹配的困扰。希望梳理以她为代表的一批真诚的主流范式研究者,在朝向“本土情境”及“多元范式”之心路历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扰。并从诠释主义立场给出了另一种“竞争性”的研究进路。

徐淑英是华人管理学界公开撰文反思管理研究最多且影响力最大的一位^[7,16,17]。从管理研究的现实困扰出发,徐淑英真诚却也直觉性地从“主流实证研究范式”走向强调“情境化研究”,关注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科学精神”且为商学院引入“(认知与社会)两种价值观”视角下“负责任的科学”。然而,朝向心灵的发现之旅却面临多重挑战。在经验上,因为徐淑英对中国(学术研究)生态复杂性并不敏感,其倡议不免“曲高和寡”。现实中近乎完全反向的学术运作机制让她的美好愿望近乎“海市蜃楼”;在学理上,首先,在坚定的实证研究者看来,“情境化、社会责任、认知-社会价值”的引入,事实上严重背离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对“科学之客观性、普适性、价值中立”的公然消解,因而无法做到逻辑自洽;其次,“认知和社会价值(近似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在哲学界只是一种“幻象”。抛开极端的相对主义观点不谈(世上没有不包含价值的事实,或者“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尼采)”^[33])。至少在组织研究中,“事实与价值”始终是缠绕在一起的^[35]。实证研究者所“看到(认知价值)”的由“变量关系”编织的世

界,隐含着其对普适规律(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社会价值)的渴望;而诠释主义研究者所“看到(认知价值)”的由“意义之网^[36]”编织的世界,隐含着其对“可能性(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社会价值)”的期待。而且,长期以来管理学界在“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纷争,未必没有“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嫌疑。而试图“平衡两者冲突”的折中看法是否又显示了另一种“实用主义的调和性”呢?

由此,本研究认为面对异常复杂且多面向的管理实践,尽管徐淑英也接受“多元范式”,但她对管理研究“科学性”的坚定信仰和对“科学研究(方法:测量-数据)”的强烈偏好,使她无法彻底了解“实证研究”在管理研究中的局限性,从而真正地接纳多元范式。徐淑英的确强调“情境化”却依然坚持“变量化”情境观,也就难以揭示情境中“不易”测量、“不可”测量等重要因素的影响^②(更不用说特定情境造成的表达禁忌)。这会严重削弱经验研究中“表征”现实的准确性、可靠性。同时,实证研究者忽视管理知识的“社会建构性^[12]”,难以分辨管理知识“情境性、普适性”的本质,如何把握“普适-情境-普适”的转化。至于她提倡“社会责任”,引入“认知-社会价值观”,又如何与“客观性、中立性、普适性”达成和解。本质上,“责任”不仅是价值观的,更是政治的,最终只能是诉诸权力(包括学术权力)。因此,无论如何孜孜以求,希望以“做负责任的科学”这种自我矛盾的价值观重回“追求真理”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此即“徐淑英难题”。

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条诠释主义的研究进路。而且相信,于“徐淑英难题”的消解,这幅“非科学”的管理研究图景具有显著的启发性:①管理研究是一种诠释(伽达默尔、格尔茨、利科^[18,36,37])(没有唯一的客观实在性),其目的在于对管理(社会)世界意义的理解(文献[38],坦然承认价值观的在场性);②管理知识必然是情境化、本土化的^④,经验上,承认本土知识有被广泛(普遍)接受的可能,但本质上这不是“客观真理”的胜利而是成功的“社会建构”(文献

① 徐淑英习惯使用“真理(truth)”一词,也很清楚“绝对真理”并不适用于管理学语境^[16]。何况,中文的“真理”确实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笔者非常认同哲学家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希望^[33],因此,建议用“真知”取代“真理”,以突显研究者对待学术的那份“真诚”。

② 见韩巍《情境研究:另一种诠释及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一文(《管理学报》已录用,待刊发)。

③ 本研究没有仔细区分哲学诠释学(hermeneutics)与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差异。

④ 见注释②和文献[39]。

[12],“普适性”不过是一种科学主义价值观带来的幻觉);③实证研究是“意义诠释”之特殊解,已成为维护体制化知识生产最有效且最具“科学样式”的研究范式,但绝不是“诠释组织之生活意义(还原‘事实’、发现规律作为意义诠释之特殊解)”,更不用说改造世界唯一可靠的方式,因此,管理研究需要走向真正的多元范式;最后,却也是最重要的,诠释主义者从来没有垄断“意义诠释”的冲动,希望通过不断地质疑、反思(反身性)、对话,以增进理解,共同携手致力于人类组织生活“向好”的转变。

作为“对理解的理解”的“诠释学”,在格尔茨^[39]眼里不需要被定型为一种超科学。在中文语境里,笔者暂且称之为“非科学”。比照格尔茨的乐观判断,从“试图通过将社会现象编织到巨大的因果网络之中来寻求解释”转变为“尝试透过将社会现象安置于当地人的认知架构之中以寻求解释”^[39]。尽管当下没有什么市场,但这是可以看到的关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及理论建构的可能途径。

5 结语

重新解读《蔡文》的核心:不要以科学家自居,不要为了所谓“科学性”牺牲管理研究本质上“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不要为了“维护主流研究范式,夸大国际化的意义”而偏离科学精神。笔者深知,这种有点儿自我矛盾的格局,不单是某一种方法、范式,某个学术组织或某位学术领袖的过错。它是人类几百年来,摆脱宗教束缚,祛魅形而上学,凭借科学技术成功改造世界后形成的集体记忆。然而,“科学”本身一旦成为信仰,就可能“意识形态化”且逐渐远离其最初的经验事实,不仅变得日益封闭^[37]且会走向它的反面,从而沦为“规训”的工具^[40]。感谢科学哲学家、感谢后现代主义研究者^[33,40,41],让我们有勇气重新审视“客观、理性、科学”这些曾经比肩上帝的“真理性说辞”。我们至少可以好奇:人类的组织生活是否只有“客观、理性、科学”的面向^[42],从而只需要且能够仅从单一的“科学维度”去全面地理解和揭示(发现),进而奢望凭借这种狭隘的认知对管理实践指点迷津。

管理研究今天在全世界所遭遇的尴尬,不仅在于大家所争论的“严谨性和实用相关性”,或是“情境化和普适性”。更为根本地,是因为集体性地为人类组织生活(个体生活)预设了一种太过单调的前景并加以信仰化。大家从历史、文化、社会获得了关于人类组织生活的“科

学主义(实证主义)想象”,就习惯于规划形形色色的“社会工程”,包括大学及学术研究本身。由此,管理研究有必要转向一种全新的关乎“更多可能性”的意义生成过程从而为“非科学性”留出空间。何况大家心向往之的“国际彼岸”不是早就这么做了吗? CZARNIAWSKA 描述过6类不同的组织理论:科学(主义)性的、革命性的、哲学性的^①、教育性的、民族志的以及诗意性^[43]。

人类的组织生活不仅涉及效率、效益,还关乎责任、尊严,意义和审美^[44,45]。大家都是茫茫宇宙中十分偶然的过客,但作为管理研究者,值得向往且追求一种经过审视的学术生活,而且,无论是否自以为或被认为是一名真正的“scientist”。最后,请参看 MAANEN^[46]转引的“洞见”:对于学术研究,只有两件确定的事情:①我们终将被证明为错;②我们都会逝去,成功的学术生涯不过是在我们临终之前,依然正确而已。

参 考 文 献

- [1] 普特南 H.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M]. 应奇,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2] ANNA D, NIKOLA B. Explaining Life: Synthetic Biology and Non-Scientific Understandings of Life [J]. EMBO Reports, 2012, 13(11):959~963
- [3] 邓晓芒. 作为“大科学”的人文科学:一种“正位论”的思考[J]. 哲学分析,2016, 7(1):111~119
- [4] 蔡玉麟. 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J]. 管理学报, 2016, 13(8):1 135~1 149
- [5] 张静, 罗文豪, 宋继文, 等. 中国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J]. 管理学报, 2016, 13(7):947~957
- [6]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 管理学报, 2008, 5(3): 320~322
- [7] TSUI A S.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1~14
- [8] HAGGIS T. ‘Knowledge Must Be Contextual’: Some Possible Implications of Complexity and Dynamic Systems Theorie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2008,40(1):158~176
- [9] REED I A. Epistemology Contextualized: Social-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 Postpositivist Era[J]. Sociological Theory, 2010, 28(1):20~40
- [10] ASTLEY W 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as Socially Constructed Truth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5, 30(4):497~513

① 在对 March 的归类上,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 [11] GERGEN K J, THATCHENDERY T J. Organization Science as Social Construction: Postmodern Potentials[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96, 32(4):356~377
- [12] 伯格 P, 卢克曼 T. 现实的社会建构[M]. 汪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3] 史密斯 K G, 希特 M A. 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M]. 徐飞, 路琳, 苏依依,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4] 徐淑英, 任兵, 吕力. 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5]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TSUI A S.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3, 9(3):375~394
- [17] 徐淑英. 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J]. *管理学季刊*, 2016, 1(2): 1~23
- [18] 伽达默尔 H G.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19] MORGAN G. Paradigms, Metaphors, and Puzzle Solving in Organization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0, 25(4):605~626
- [20] LEWIS M W, GRIMES A J. Metatriangulation: Building Theory from Multiple Paradig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4):584~602
- [21] TSANG E W, KWAN K. Replication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 Critical Realistic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4):759~780
- [22] 韩巍. 论实证研究神塔的倒掉[J]. *管理学报*, 2011, 8(7):980~989
- [23] SCHERER A G, STEINMANN H. Some Remarks on the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J]. *Organization Studies*, 1999, 20(3): 519~544
- [24] 黄光国. 社会科学的理路[M]. 3版. 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 [25] 陈明哲, 吕力. 管理学研究的“精一”、“双融”和“经世致用”:对陈明哲的访谈[J]. *管理学报*, 2016, 13(1): 1~6
- [26] 尚虎平, 惠春华, 叶杰. 从绩效至上到科研消费主义:我国公共财政资助科研基金中科技观的异化与矫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 28(6):82~86
- [27] 韩巍. 学术评价的回归及业绩管理的矫正[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4(3):8~17
- [28] 艾森哈特 K, 李平, 曹仰锋. 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9] 布莱迪 Y. 人类学诗学[M]. 徐鲁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30] 纽曼 L. 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M]. 第5版. 郝大海,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1] 邓津 N K, 林肯 Y S. 定性研究(1-4)[M]. 风笑天,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 [32] CUNLIFFE A L. Reflexive Inquir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Questions and Possibilities [J]. *Human Relations*, 2003, 56(8): 983~1 003
- [33] ALVESSON M, SKOLDBERG K. Reflexive Methodolog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Inc., 2009
- [34] JIA L D, YOU S Y, DU Y Z.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2, 8(1):173~209
- [35] 威廉斯 B. 真理与真诚[M]. 徐向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36] 格尔茨 K.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
- [37] 利科 P.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M]. 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 [38] 舒茨 A.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 游淙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 [39] 格尔茨 K. 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 杨德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 [40] 凯尔纳 D, 贝斯特 S.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 张志斌,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41] 埃尔弗森 M.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M]. 甘会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42] 马尔库塞 H.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 [43] WEICK E. Mundane Poetic: Searching for Wisdom in Organization Studie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4, 25(4): 653~668
- [44] GHOSHAL S.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05, 4(1):75~91
- [45] ADLER N J. Finding Beauty in a Fractured World: Art Inspires Leaders-leaders Change the Worl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5, 40(3):480~494
- [46] MAANEN J V. The Present of Things Past: Ethnography and Career Studies[J]. *Human Relations*, 2015, 68(1): 35~53

(编辑 郭恺)

通讯作者:韩巍(1969~),男,陕西西安人.深圳大学(广东省深圳市 518060)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本土化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和谐管理理论. E-mail: hanwei69@szu.edu.cn